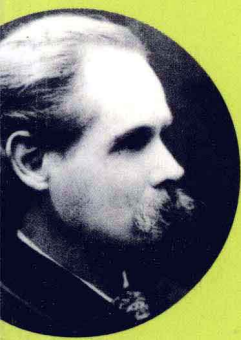




西方
大经济学家
传记译丛

*A Soaring Eagle: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翱翔的鹰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传

[澳] 彼得·格罗尼维根 / 著
丁永健 鄢 雯 / 等译



西方
大经济学家
传记译丛

*A Soaring Eagle: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翱翔的鹰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传

[澳]彼得·格罗尼维根/著

丁永健 鄢雯 等译


華夏出版社
HWA Hsia Publishing Co., Ltd.

目 录

前言	1
第1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生平：引言及概论	1
第2章 家庭和世系	16
第3章 童年和校园生活（1842~1861年）	35
第4章 在圣约翰学院的本科生涯（1861~1865年）	50
第5章 职业探索之路（1865~1872年）：圣约翰学院的讲师岁月	68
第6章 经济学学徒（1867~1875年）及之后的学术生涯（1876~1879年）	94
第7章 善察好学者之旅：欧洲、英国和美国	125
第8章 丈夫和不同寻常的伙伴	155
第9章 最初的学术生涯（1868~1884年）：剑桥、布里斯托尔和牛津	193
第10章 剑桥大学教授（1885~1908年）	218
第11章 向政府提议（1886~1908年）	247
第12章 《经济学原理》的漫长征途（1881~1922年）	283
第13章 据理力争的辩驳者和拥护者	311
第14章 一位理想的女权主义者	335
第15章 新的优等考试的创立者	363

瀑布状美景观的喜爱。马歇尔也对艺术很有兴趣，尤其是绘画和音乐，他在“红皮书”^①中收集的信息，以及完全出于非专业目的而收藏的一些名人的肖像画，都说明了这一点。他的生活也说明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反应，一方面对社会主义的极端规定心生恐惧，同时也对它所带来的新思想和社会观点表现出兴趣。马歇尔对社会主义的倾向是丰富多变的，一开始是在教学中讲授其观点，到后来更积极地参加边缘的合作组织，而19世纪70年代早期及以后也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观点。马歇尔的一生展现了丰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全方位地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一位有抱负、善变又有怪癖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喜怒哀乐。

本书内容

马歇尔丰富而长寿的一生的各个方面很明显要摆在首位。对马歇尔一生的传奇来说，经济学虽然是主要的，但也仅仅是一部分。经济学的内容通过多个方面来反映，包括马歇尔作为一位经济学思想家和著述者（第6、12和19章）、一位经济学教育家（第9、10和15章）和一名“鲜明的”经济观点的传播者（第11、13和17章）的各种活动。很多关于经济学的素材涉及他的旅行（第7章）、退休（第17章）和友谊（第18章），并且经济学也是他最主要的遗产（第20章）。他终生感兴趣的一些人和事使他的传记的绝大部分变得更为精彩。作为历史上一位早期的专业学术经济学家，马歇尔以自己卓越的贡献提高了这个学科在社会上的地位，在他的传记中出现诸多的经济学素材当然也不足为奇。

本书有几章专门讨论经济学，其安排还需要进一步说明。马歇尔经济学思想的发展是按照他所发表作品的年代划分的，其中第一阶段包括他自己称为经济学学徒的岁月。他经济学思想发展第一阶段重点强调了他学习经济学所打下的广博基础，包括对穆勒、古诺、冯杜能以及斯密、李嘉图著作的学习。马歇尔首次出版著作则意味着这一阶段的结束。最早的著作都是于1879年私自印刷的，包括《国外价值和国内价值的纯理论》，以及（和他的妻子）合作出版的《工业经济学》。虽然这两本书的内容不同，但都显示出马歇尔当时已经脱离了他最初的导师约翰·穆勒的经济学思想。

马歇尔经济学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主要涉及了他的著作——《经济学原理》——还包括他完成这部著作的艰难之路、永不停歇的修改、准备出版它的缩略版（1892年的《工业经济学要义》）以及长期以来希望撰写却最终搁浅的第2卷。第12章阐述了该书撰写和修订的时间，但并没有对其内容进行详细分析。

《经济学原理》的最后一部分与马歇尔经济学思想发展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是重合的：第19章介绍了1919年和1923年先后出版的最后两本书的内容，以及关于出版一本关于进

^① 红皮书，里面是马歇尔记录的每年的经济数据以及在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发生的事件。——译者注

主要经济问题在英国的共识才开始彻底瓦解，所以马歇尔对这个时代的特征反应被大量记载了。

为了记录马歇尔成长的背景，考虑维多利亚中期的发展特征是很有帮助的。这些年是社会转型时期，而且达到了社会的发展顶峰，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后来称之为“奋战的60年”。但是只有一些大事件直接影响了马歇尔及其家人的生活。其中一件事就是设计、建立和收藏水晶宫（即1851年的5月1日到10月15日令人吃惊的巨大博览会）。不难想象，不到十岁的马歇尔肯定在家人的陪同参观了水晶宫，就像当时很多其他人一样。1848年4月的宪章运动分子请愿游行也同样直接影响了马歇尔的家庭，这导致英格兰银行采取了预防措施以抵制可能发生的内战和骚乱。1848年（也是当时欧洲革



丽贝卡·马歇尔

命时期）让社会学家感到恐惧，将他们推到了政治生涯的最前线，尤其是由路易·勃朗、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查尔斯·傅立叶和克劳德·亨利·圣西门设计的法国发展形式，马歇尔很欣赏这些发起人，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为他们作演讲。这个多事之秋的一年给欧洲大陆的几乎每个国家都带来了骚乱。同时，它也撒下了民族主义、体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种子，并在几十年后有所收获。然而，在英格兰的情况却恰好相反，伴随着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始，宪章运动由于主要政治当局的压迫而结束，而且得到了马歇尔的剑桥同事、灵活的领导者弗雷德里克·莫里斯和查尔斯·金斯利以及熟人如勒德洛的大力支持。

19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发生了许多其他显著的大事，例如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学和科学事件。1843年是罗奇代尔先锋之年和首次工人阶级的社会合作之年，后者也是成年马歇尔最感兴趣的一个运动。随着《皮尔银行法》的制定，1844年标志着通过立法解决了十年前关于货币银行学的争论。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预示了大不列颠时代自由贸易的真正开始，这也标志着一系列贸易限制及1849年《航海法案》的废除是10年来经济自由主义成长的象征，与此同时，对工作场所的限制也不断增长。1842年，《工厂法案》明令禁止私下招聘妇女和儿童，1844年规定了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时间，随后在1848年确保了某些特定行业（如纺织业）的男性工作时间。马歇尔的第一个十年生活和不断发展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时间是相符的，而且经济也在一系列规定和改革中日益自由化。

19世纪50年代也同样令人兴奋。1851年，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澳大利亚开始了淘金热，英国和法国之间铺设了潜水艇航线。1852年，第一届合作社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与此

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而不会令人惊讶。

瓦伊纳认为这是首次对马歇尔生平的记述。本书尝试着尽可能全面地、不隐瞒缺点地展现他的一生，侧重于马歇尔的社会哲学，并与他的经济学理论相联系，避免局限于一个时期的片段或是面面俱到、平分秋色。

第 2 章

家庭和世系

读者在阅读 1889 年马歇尔的相关著作《同时代的男人和女人》时，很容易认为马歇尔就像圣经中的人物麦基洗德一样是个无父无母的人，甚至于没有出生地。这一信息大概是由马歇尔自己提供的，出生日期之后紧接着就是他学业上的造诣，并着重记录了他后来的学术生涯。梅纳德·凯恩斯的《马歇尔回忆录》在这一部分的改动微乎其微。该书的开始就列举了他的出生日期、错误的出生地、父母的姓名以及在他出生时对他父亲职业的错误描述。接着描述了马歇尔一家是个“西部牧师家庭”，暗示了马歇尔的曾曾祖父（即牧师威廉·马歇尔）是个大力神般的传奇牧师。除了谈及他的曾祖父——牧师约翰·马歇尔，是他将马歇尔与霍特里家族（以及后来的经济学家霍特里）联系起来的一一之外，这就是凯恩斯对马歇尔世系的所有讨论了。可见，这个家庭的境况也只是稍微不错而已。

第二段描述了马歇尔父亲的各种形象，之后讲到了他的一位叔叔和一位姑妈，不过他们都是他父亲的旁系血亲，凯恩斯没有提到这些。另外只是很少地谈论了这个家庭。对于作为优生学家的凯恩斯因此认为遗传只在有限的条件下是有作用的。书中通过马歇尔出身牧师家庭解释了马歇尔是个“传道士”。马歇尔“对女性严厉”是因为他父亲在家里的专制造成的，更隐晦的是，马歇尔对货币和银行感兴趣，是因为之前他的父亲在英格兰银行任职，且不正当地被提升为出纳员，而不再是卑微的小职员。

如果马歇尔本身对遗传尤其是父母对后代的影响很感兴趣的话，那么就像他一直忙于高尔顿运动一样，他恢复对家庭和世系的错误描述这一行为是合理的。对这些的改正比一味迎合当时高尔顿的口味更切合实际。马歇尔故意掩盖他的出生地以及隐藏他的家庭背景的事实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性格中一方面的特点，同时也表明马歇尔对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就他的学术成就所给予

被废除了。至此马歇尔一家才永远告别了这个不卫生的伯蒙德西区。

对 19 世纪伯蒙德西区的描述可以解释马歇尔隐瞒其出生地的原因：

伯蒙德西区——“皮革之乡”，至今仍然享有这一盛名——是一个人口稠密、繁华的商业地区。这里的繁荣工业与其他方面的普通之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街道总是阴沉沉的，除了一个美丽如画的旧公寓，感觉它就是用一层一层的石头接起来的，脆弱得“摇摇欲坠”，很多到过这个街的人都暗自同意这个名字，很明显这条街很难满足人们的视觉。一些贵族在这里居住，控制着伯蒙德西区的很多街道。这里有一条铁路，时常有火车喷着烟、载着乘客，就像一个工作过度的巨人一样；一座贵族学校、一个如画的教堂美化了这里，但是它们总被用来形象地显示这个地区的令人不悦的特征……在伯蒙德西区有一个大的行业……几个世纪以来，该地区一直是皮革制造中心和皮革贸易中心……同时制帽业也很繁荣。这个地区的交叉处有无数的水槽，为皮革厂带来了许多稀缺的设施，但是同时它也给这里拥挤的人群带来了可怕的灾难。

伯蒙德西区的皮革行业一应俱全：隐藏卖家、皮革制造商、皮革修整商、摩洛哥皮革修整商、贩卖皮革商以及皮革切割商、导游、羊皮纸制造商、羊毛批发商、马鞍制造商、采购商、皮革干燥商以及胶水制造商。这些都需要接触皮革的人有很强的意志力，来忍受这些“难闻的气味”，包括制造皮革、买皮革和用做肥料和制造胶水的其他垃圾的过程中的刺鼻气味。就像《伦敦百科全书》所引用的狄更斯在《老梅林的伦敦》中对伯蒙德西区的皮革市场的描述一样，他评论这个地方像“恶魔一样恶臭”，当老梅林在这里进行一段不愉快的贸易时，评论说这个地方的产品质量很好，像一些小孩的手套和书皮，但是就是味道太难闻了，这些都给马歇尔的出生地增添了几分色彩。虽然夏洛特街挨着这个不受欢迎的皮革厂，但是它离臭名昭著的雅各布岛还是很远，即老梅林描述中世纪维多利亚的伦敦时提到的可怕贫民窟，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中比尔·赛克斯就死在里，这就更增加了维多利亚中期社会的伯蒙德西区的坏名声。

在二战中，伯蒙德西区被摧毁，因此无法对马歇尔故居进行参观。然而，伯蒙德西区臭名昭著的坏名声完全可以解释马歇尔隐瞒自己出生地的原因。马歇尔后来对贫穷问题很关注，一直想去参观英格兰和苏格兰主要城镇的贫民区，这让他想起早年生活在离真正的贫穷很近的地方，以至于后来他都想极力开发这些他十几岁时曾居住的地方。

“一个无私、和蔼、善良”的父亲：威廉·马歇尔（1812—1901）

在马歇尔小的时候，父亲是个英格兰银行的职员，年薪 140 英镑。当时威廉·马歇尔差不

事实的重述也充分显示出她的文学水平：

查尔斯是阿尔弗雷德特别喜欢的一位叔叔，他不喜欢受到在托特尼斯的哥哥威廉的管制，便离家出走，在船上做服务员。他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并且在澳大利亚挖到了他的第一桶金。他在完全不懂德语的情况下去了德国，购买了一些羊带到澳大利亚。同时他还以高薪雇用了一位牧养者，以保证每一只羊都能顺利到达。他雇用的工人全部都是盲人、瘸子和其他残疾人。他能够在淘金热到来之际保持牧场正常工作，而其他人的牧场都受到了淘金热的冲击，严重缺少劳动力。这使得他成功地赚取了超出羊毛^①以外的更大财富。

查尔斯的发家史是与众不同的，对于他的“天赋”有一个更加准确的描述。他将深谋远虑和身上所带有的那种“家庭的怪癖”运用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的澳大利亚牧场中，确实是一种很好的寻租手段。但是对于查尔斯·马歇尔到达澳大利亚的确切时间、具体的状况以及他是怎样从一个出走的孩子变成一个富有的牧场主，却都不为人知。在1851年的淘金热之前，他已经相当富有了，当时他居住在达林镇，那是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南部的一个牧场区。在19世纪40年代前，就有很多人涌入到这里，查尔斯也正是在这个恰当的时机移居到这里。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更准确地说是一直到1866年的危机以前，那里的地主或者说是牧场主能够从羊的饲养和羊毛及羊肉的销售中赚取大量利润，正如人们所形容的，他们如同在“制造货币”。1848年8月，查尔斯在达林同几个当地人合伙申请了租赁权。到1851年，查尔斯·马歇尔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富有的牧场主。1855年，他逐渐开始与合伙人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同时建立了更多的伙伴关系，这种业务的拓展一直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初，斯莱德是他的最后一个合伙人。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期间，他购买了一些土地，并在采矿行业大量投资。1851年，在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淘金热的冲击造成这些殖民地的劳动力供给严重短缺。随之而来的是这个地区对肉畜的出口需求量严重超过它的供给量。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851年，他同在印度西部的好友达夫森亲自到那些金矿去考察。他们用最简陋的烤箱还有一些水、盐和面粉，使用澳大利亚原著民的烹饪方法，作出了一些在当地人看来十分“美味”的面包。就这样，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热给他的牧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① 根据玛丽·佩利为凯恩斯的自传提供的笔录中所介绍的，当时德国绵羊的越洋贸易十分盛行。1862年，查尔斯·马歇尔从德国购买了大量的绵羊。关于这方面的叙述是真实的，因为从1841年的人口普查相关资料可以查阅到，当时查尔斯的职业如同“水手”一样不稳定。玛丽·佩利这个“独立男孩创业的故事”经过凯恩斯的巧妙改造（尤其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一段）后被记载下来。这个故事似乎让我们感觉，马歇尔本应该脱离家庭的控制，独立完成在剑桥大学的学业，在几何学方面有所发展，找到自己真正的“天堂”。——原书注（除非特别说，本书脚注均为原书注）

宽了获得奖学金的条件和学院考试范围的限制。凯恩斯指出，至少在两件事情上马歇尔受到了贝特森的特别照顾。1868年，贝特森为马歇尔在伦理学方面设立了一个特殊的讲师职位，而此时学院已经有两个这样的职位了。马歇尔对凯恩斯说，这个“善意的行为”决定了“他的一生”。1877年，贝特森为他写了一份强有力的推荐信，帮助他到布里斯托尔大学就职。信中他对马歇尔的人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简朴、认真、具有自我牺牲精神”。贝特森还指出，“在他作为学院讲师期间，工作认真负责，讲课生动，很受欢迎……他把心思全都扑在工作上”。虽然贝特森没有在他的学院或大学里实行过变革，有时还在某些改革问题上表现激进，但他一直广泛致力于改进学院和学校的社交与教育问题。

从19世纪60年代学院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出马歇尔是怎样度过他的大学生涯的。首先，每周必须要参加7次礼拜仪式，早礼拜是在7:15举行，周末和宗教节日的晚上会有唱诗班唱歌。只有一个男唱诗班，“他们奔波于各个学院中间，因此每次演出的时间都比较短，对于那些被迫演出的学生来说，这段时间也并不算难熬”。晚礼拜是下午4:00于晚饭前在食堂举行，每学年除了学院节日外天天都要举行。晚餐主要包括“蔬菜、肉和学院自酿的啤酒”，科伦索大主教在回忆他1832年的大学时代时说，尽管学生们拿到的肉菜已经凉了，不过确实也算是一道盛宴了。早餐由学生们自行解决，这时贫困学生就会很节俭，而富裕的学生则享受着有“火腿、鸽肉派和排骨的丰盛早餐”，来度过早上这段最美好的时光。学生饮食服务处每天都为所有住校的学生提供黄油和面包。

学校早上8:00开始上课，下午一般没有课，周日休息。如果聘请了私人教师，则上课时间还要长些。圣约翰学院著名的数学教师托德亨特从上午8:15到下午3:00都有课，吃过饭后，晚上5:30~10:00又要上课。对私人教师来说，这种时间安排是很正常的。下午通常是划船和板球运动时间，这是当时仅有的两项学院运动；根据各人爱好和经济条件，还可以进行骑马、散步、游泳、象棋或打牌等活动。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晚饭后他们会参加酒会或其他的社交聚会。攻读荣誉学位的学生只能极不情愿地放弃这些休闲而努力学习。马歇尔的大学生活将在本章末进行描述。

数学优等考试

19世纪60年代时，数学优等考试在剑桥的成功人士中评价极高。长久以来，该学位严格考核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胜任工作的能力，对考试成绩优异者颁发奖学金，这些为其赢得了极高的赞誉。在剑桥悠久的历史中，管理结构及主要课程都发生过巨大改变。从1763年起，考试由辩论改成了笔试。到19世纪40年代，就只授予数学荣誉学位了。随着1824年开始实行初试和入学考试，存在多年的哲学和神学的荣誉学位被完全取消了。1848年，优等考试的形式开始规范化。考试分为两个阶段：先是为期3天的六项基本考试，一个星期后进行为期5天的

怀疑论两者关系的看法，不过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评论可能不妥，对莫里斯有所“冒犯”，马歇尔接着写道：

我不走寻常路，先介绍了巴特勒的方法，也提到了研究材料和著作都不怎么样的皮洛，其实我本不该讲这些的。我甚至也没有解释清楚实证的难点，以及在日常商业经营中常犯的错误。

遗憾的是如今没有找到克利福德和莫尔顿参加会议时的记录。那个时候马歇尔悉心研究哲学，在讨论中表现越发出众。30年后马歇尔回忆说，从1867年的会议记录中能看得出他在哲学上是个新手。

在马歇尔所保留的1867年的会议记录里还记载了一些晚餐谈话、论文朗读后的交谈之类轻快的内容。在3月14日的会议上，大家谈论政治，话题围绕着当时迪斯雷利政府实施选举权改革一事，提到了约翰·穆勒说服海尔实施选举改革的可能性，也谈到长期卷入选举改革一事的布莱特政府会如何应对，还有克兰伯恩勋爵和格拉德斯通的重归旧好以及保守派反对德贝提案陈列的观点。11月份，马歇尔纪录的最后一次会议话题是巫术，如催眠和透视，会上主要是西奇威克和莫里斯两人发表意见。当时弗雷德里卡·哈里森著的书《伯爵》涉嫌抄袭，西奇威克通过比较《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抄袭的流言并非无中生有，这是会议记录中最接近神学的一次讨论。

格罗特俱乐部的早期活动也使马歇尔和同事皮尔逊、梅厄有了些来往，两人都是圣约翰学院的伦理学讲师。马歇尔的一本回忆录中，在关于格罗特俱乐部的章节里有形容皮尔逊：

他是继西奇威克后伦理学的中坚力量，帮助过梅厄，还是虔诚的教徒。他教出了很多品格高尚但不怎么能干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大部分是圣约翰学院的学生，将来都准备从事神职，或许就是这个原因，他也把学生是否通过伦理课赋予了浓烈的宗教味道。

天王星协会更具有神学的色彩，由韦斯科特、莱特福特和霍特等剑桥学者和有资历成为主教的人于1872年发起成立，旨在进行跨学科的辩论而非说教。1896年，西奇威克在霍特的传记中这样描述这个组织的作用和它的会员：

协会最初创立的宗旨就是代表多个学科的学术研究，为跨学科的交流提供机会，在更为严肃的技术性层面上交流思想，而不仅仅是一个社交场所。我和克拉克·麦克

同意这些观点”。杰文斯时代过去后，马歇尔的学徒生涯进入了第二阶段，此时他“在用数学处理垄断理论和用图表处理穆勒的国际价值问题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1873年剑桥大学哲学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他展示了前一个方面的理论框架；在1879年一本私人印刷的期刊里，他收录了其对国内价值与国际价值进行理论科学研究的全部成果。“在1871年杰文斯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没有出现之前，尽管我没有用英语，但是我已经用数学得出我现在的整个理论的体系框架了。”到1879年为止，大多数理论空白已经被填满，而且马歇尔理论体系的基本要素也已经完善了。

正是基于这些信件，以上才特别提到关于杰文斯的争论，同时这些信件也解释了因为马歇尔关注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核心，所以至今他都主张理论优先。这个特殊目的表明了信中几处未提及的内容，比如这些信完全忽略了更广泛促进马歇尔研究经济学的激励因素，也未提及他在经济学上层建筑方面——货币、经济波动、信贷、资本市场、国际金融、政府职能和公共财政——所做的扎实工作，并且对于马歇尔的主要经济学理论导师，只狭隘地关注了穆勒、冯杜能和古诺，但是使马歇尔在范围和方法上收获颇多的导师斯密和李嘉图不能不提。1910年更全面的自传框架就部分弥补了上述缺陷。这表明在列出理论研究计划的大纲时，马歇尔还批判性地研究了“罗雪尔及其他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思、拉萨尔和其他社会主义者——所采取的经济学新观点”。此外，在“最后”（暗指1866年或1867年之后），马歇尔放弃了“所有关于返回哲学的思考，他开始密切接触实际业务和工人阶级的生活。一方面，他开始学习每个主要产业技术的广泛特征；另一方面，他开始与工会成员、合作者和其他工人阶级领导者交往”。

上段最后一句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马歇尔在经济学思想方面的真正改革。他渴望抛弃古典经济学在改善工人阶级未来可能性这方面的悲观结论。这是古典经济学在静止状态上的观点，暗含着由于人口法则和工资法则，大多数工人处于低工资水平，最终导致人类进步局限性的出现。对于这种令人沮丧的预测，马歇尔渴望并确实制定了一套进步的法则，包含改善人类本性的可能性。通过呈现对所有人物质和精神上改良的前景，马歇尔希望创造一个更愉快的政治经济环境，从而消除卡莱尔已提出的那种“沮丧”的描述。

这项诉求将建立在两种基本类型的研究上。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打破束缚经济学以及诅咒工人阶级命运永远悲惨的人口与工资的铁律，并要求进行技术可行性的研究。对长期递增收益前景的巨大迷恋，正是马歇尔经济乐观主义的一部分。此外，他还要求对工人阶级本身进行研究，尤其是对它在合作及工会运动中所呈现出来的那些更自由的元素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使得他能够评估人类性格被改善的程度与速度。尽管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和逻辑已在这项冒险中指明了方向，马歇尔还是至少在两方面与穆勒的观点不同。首先，他开创了连续的概念和静止状态意义上的演化进步的概念。事实上，马歇尔将后者从古典经济发展理论方面的顶峰降级到价格理论的一个初步简化。其次，他将穆勒的有着机器般享乐主义的经济人用道德责任感来替换

在某些方面，更重要的德国经济学影响还是体现在理论上。如施特莱斯勒，这位德国经济学家对马歇尔的潜在影响可以表示如下。1825~1875年之间的德国经济学课本将增长与生产的古典理论、个人需求和效用起显著作用的价格理论与分配理论混合在了一起。从它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意义上来说，这标志着“新古典主义”体系的形成，即半古典、半“新”。德国的经济学教材——1870年前马歇尔阅读了赫尔曼、罗雪尔、劳和曼戈尔德的教材——都是从商品开始，然后是需求理论，再然后是劳动分工、产业组织、储蓄，以及关于土地、劳动、资本及企业家精神的要素。这种结构类似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框架。价格理论，通过供求分析，始终不变地用于处理个别价格和市场分析。用施特莱斯勒的话说，这些德国经济学家“相对来说很快就满足于他们找到的供给和需求背后的原因”，而不是对如何满足需求以及成本理论进行深入钻研。“他们总是一次处理一种价格。德国经济学家……在需求和供给的局部均衡分析上做得非常出色。”

其中一些德国作家在价格分析中使用几何方法来表达供给与需求，而其余部分仍然被限制在他们的工作范围之内。这方面最为复杂的尝试是由曼戈尔德进行的，他用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来图示个别市场的价格决定。需求函数明显与效用相联系，曲线的转移由人口增长、偏好变化——或更一般地说是经济增长、收入和财富增加——来解释。此分析中的需求曲线是凸向还是凹向原点，取决于所分析商品的特点，即是奢侈品还是必需品。同样，供给曲线也呈现出各种形状，这反映了成本行为的差别。不幸的是，马歇尔无法从曼戈尔德对供给和需求的图形分析中获益。马歇尔图书馆只有曼戈尔德去世后才出版的《经济学》，而这本书与第2版的《经济学基础》一样，缺乏一些数学处理或图表。而马歇尔对曼戈尔德版本的注释现保存在马歇尔图书馆，都出现在处理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组织的一节中。在该节中，“承办者”（企业家）的作用被重点标示了。

曼戈尔德对供给和需求的图形分析是受了劳早期但并不复杂的处理方法的启发。这个可以在马歇尔图书馆中找到，劳1847年版的《原理》是马歇尔在德国购买的一本二手书，购买时间则很可能是在他学习经济学的早期阶段。劳认为他的分析对用代数化的方式重新阐述该理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这种重新阐述只适用于有一条线性需求曲线和一条垂直供求曲线的简化情况。更有趣的是，他将价格放在纵轴上，数量放在横轴上，而这个变化正是后来马歇尔成名的原因。因此，马歇尔充分意识到了劳的贡献的重要性。1879年，他借给杰文斯一本劳的书的复印本，那时杰文斯正在构建他的数理经济学的附录；1910年，他借给梅纳德·凯恩斯这本书的第5版，这本书随后就一直在凯恩斯那里。来自德国的理论灵感和帮助因此触动了马歇尔的分析结构、方法和“曲线”，因此德国经济学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他在经济学上关于历史和人性的思考。

速度，但是当代它们已经发展出来的沟通方式正在形成，可能适应新时代环境的产业组织。

对图表分析的课题同时也被提出来了。接下来的引用对这些分析中固有的一些不完善之处进行了思考。与一些当代的实践家不同，马歇尔痛苦地意识到，运用他的分析工具获取实际并有用的结果是很困难的：

在任何情况下，通过近似决定曲线的形状来发现法则，似乎还不能超越目前的统计学提供给我们的资源。确实，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当它完成时，移交这些被分析数学过程操纵的曲线将是值得的。但是那时，对曲线的数学处理仍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从对图形的检查中就得出的结果。即使那时，数学分析方法也不能在决定汇率指数波动的任务中提供任何可观的帮助，因为在用我们能得到的近似法则代表在任何位置都能对汇率指数施加影响的横轴和纵轴的力量大小之前，还有大量额外工作要做。最后，即使这个困难也解决了，在该问题的数学处理上仍然存在困难。有必要重视并关注这些困难，因为它的延伸非常广泛，在某种程度上会损害由图形方法提出的问题处理方式的有效性。

后来很多令马歇尔成名的经济理论都包含在这本早期的著作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消费者租金的概念及对税收中过度负担原理的改编。奖金和税收对生产者剩余的潜在影响也得到了审视。国内价值理论包括大部分早期关于价值的论文材料，涉及多重均衡及其稳定性、下降的供给曲线的不可逆转性及其他马歇尔后来使用价值分析的大部分复杂程序。国际贸易的理论科学提供了直到20世纪40年代晚期仍在国际贸易课本中使用的曲线分析，应用这些工具来解决贸易收益、贸易条款、潜在福利和关税带来的损失等问题。与1904年马歇尔写给坎宁安的信相比，此书中没有垄断分析，因此折中福利概念的优先权不可能在1878年或1879年出版时就建立了。根据马歇尔的观点，古典作家在他们的大部分学说里都有“真实的元素”，但是他们的理论通常被认为是“缺少使之成真的必要条件”。尽管如此，此阶段他还是愿意压缩案例，因为至少斯密的一些学说“肯定是荒谬的”。

一些早期出版的作品（1873~1879年）

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学徒时期，第一个出版作品是他对杰文斯的评述，这点已经讨论过了。1873年10月，在书中有两页关于“垄断的经济问题，用一系列双曲线进行图示分析”，也都已经简洁地提过了。这两页引出了由其学生亨利·坎宁安发明的用来画一系列有相同渐近线的

的1920年这两个假期都是在马歇尔最喜爱的南蒂罗尔度过的。最后的三个暑假——1921年、1922年和1923年都在海谷度过的，主要用来构建《货币、信用与商业》（准备于1922年夏移交出版社）以及做关于经济发展最后一卷的工作，后者唯一可以看见的成果是无数的注释及部分目录。

以上总结包含了本章接下来的内容中将会提到的主要地点，大部分是根据通信或笔记的可得材料综合而成的。讨论完马歇尔的单身旅行之后，我们将要审视其旅行经历中的两个亮点。第一个是1875年夏的北美之行，大部分时间在美国；第二个是因健康问题而从1881年10月初开始的、为期12个月的意大利与巴伐利亚之旅。

在大山中度过单身暑假（1867~1876年）

因对马歇尔毕业后的第一个暑假了解得很少，这份总结只是简短地提到他去了一次苏格兰。第5章提到，第一次来“考察几个城市的贫穷地区”，目的是研究使他最初对经济学产生兴趣的贫穷面貌。在接下来的暑假里，莫兹利兄弟引导马歇尔爱上了高山攀岩活动。他们带他去攀登米伦镇以及意大利和奥地利蒂罗尔的多罗米蒂地区的大山。

因此，马歇尔的暑假符合玛丽·佩利后来向凯恩斯描述的那种模式：

取得学位后，他几乎每个长假都去国外。他随身带着60英镑和一个背包，大部分时间都在高高的阿尔卑斯山散步。这样一个夏天接一个夏天的散步，他的身体也从羸弱变得强壮起来。6月初离开剑桥的时候还筋疲力尽、劳累过度，而10月回来的时候，皮肤被晒黑了，身体也变得强壮和挺拔了。背包能使背部保持挺直，因此，当马歇尔年过八旬的时候，还保持着这种习惯。在阿尔卑斯山行走的时候，他习惯于6:00起床，8:00返回。为了避免大雾降临，他会背着背包一直走两三个小时不休息，直到可以找到路为止。然后他才会坐下来休息，有时是在冰河上，还有很多书——歌德的、黑格尔的、康德的或赫伯特·斯宾塞的——然后继续前行到下一个终点站。他会在湍急的溪流里洗衬衣，然后把登山杖扛在肩上晾衣服。大部分艰难的思考都是在这些孤独的旅行中作出来的。这些漫游使他爱上了阿尔卑斯山，甚至1919年当他最后一次去南蒂罗尔的时候，他还坐在户外工作。

当然，此时阿尔卑斯山攀岩也是“上流社会的新运动……当法国铁路能够到达巴塞尔和日内瓦，而瑞士离伦敦只有一日之旅，且路费不超过10英镑的时候……1855年，一次请五个脚夫和三个攀岩冒险的向导，只需几个朋友每人分担4个英镑”。与马歇尔几乎同时代的剑桥大学的莱斯利·斯蒂芬就是一个著名的登山者。

马歇尔使用这些自己观察到的例子的方式，大部分都与《经济学原理》有关。本文中一个有趣的特征是，这些例子的使用都非常频繁。它们贯穿在整本《经济学原理》中，一直到因为过时而丧失了起初的价值。这表明，在这些视察之旅中存在着偶然经验主义的危险。

此外，正如惠特克曾经注意到的，用这种方式获取数据的程序，代价不菲。它占用了宝贵的写作时间，尤其是当大部分这种类型的数据都可以从书籍中有效地获得时。它也向世人展现了马歇尔对尝试几乎不可为之事的迷恋，即“从所有层面理解这个永远变化的经济现实”。当然，这些产业之旅并不是本章开始前像马歇尔在其自传中所声称的那样，只是为了学习技术和其所暗含的工资水平。玛丽·佩利在其笔记中也推翻了其他的目的，而是与马歇尔作为一名社会探求者和改革者的形象一致。大部分观察都是关于妇女工作及其影响的，以及劳工的生存水平（住房、食物）和生活水平（娱乐、休闲、花钱习惯）及其效应，这些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了。在很多这些类似的个人考察中，将脸作为社会指数的研究显然有些别出心裁。也许这是马歇尔在尝试模仿勒普莱，用一种很随意的方式作研究。作为其全面社会调查的一部分，马歇尔夫妇既研究了工厂生产的方法，又研究了其效果。

他们采用冯杜能式的方法来收集事实：确认现有理论和观点，而不是创建新的理论与观点；阐明产业实务的所有方面，从而使得这些理论或观点在现实中都有据可循。相比数据采集时所费的时间而言，在其出版作品中，马歇尔直接可见的、使用这些数据的次数并不多。尽管如此，就像1875年美国之旅这个具体例子一样，他将这些隐藏的事实基础分别阐释清楚，然后形成了自己在妇女问题、社会主义问题和社会改革问题上的观点。

通过引用马歇尔通信中的一些简短摘要，其假期的一些其他特征也得到了凸显。在威尔士度假时，他们还访问了斯坦福德郡的陶器厂，而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食物、洗浴、画草图、在河里和海上泛舟”。对于康沃尔春天的一个假期，16年后的记录表明，他们从普利茅斯出发，途径福韦和韦德布里奇，到达博克斯特尔。马歇尔非常喜欢这种旅行模式。一封从伯恩茅斯寄给埃奇沃斯的信简洁地表明了马歇尔喜爱在暑期中从事的、第三种类型的活动：“通常，天气好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作，在悬崖上。这里的颜色非常漂亮，有很多粉色或者红色的石楠花，有明黄色的金雀花、深橙色的砂岩悬崖以及蔚蓝色的大海，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如果是在室内，那就太花哨了；但是我认为屋外的大自然是不会自我炫耀的。”

马歇尔夫妇在欧洲：阿尔卑斯山的村庄、意大利湖及经济学家茶会

如本章开始所述，1891~1909年，除极少数例外，马歇尔夫妇都在欧洲大陆度过暑假，一般来说是在阿尔卑斯山。他们的欧洲假日之旅是从1891年的夏天开始的。玛丽·佩利回忆说，这是他们的“环游”，但这次旅行现存的记录很少。这次旅行开始于8月初，最晚于9月中旬开始，有记录说去了巴黎、维也纳和德国，并安排了前一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的延迟庆

是在这些受邀的人当中，我们结识到了真正的朋友。像迪安和他的女儿雅利安小姐、珀西瓦尔一家、戴金一家、阿莱恩小姐、弗莱伊一家、皮斯一家、塔克特、一位道罗麦特的登山运动员，还有贝多医生（他们的家庭医生），这些人当中有些直到最后都与我们保持着联系。由于人际关系上的往来，在刚到克利夫顿的第一年里，我显得有些忙碌。

对于皮斯夫人，玛丽·佩利回忆道：“当在大学理事会相遇的时候，他们准备了丰盛的宴会。乔伊特、赫里福德·乔治和其他牛津大学的教授（例如亨利·史密斯、数学教授赛威廉）进行了富于机智的讨论……她经常于晚饭后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话。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家里的常客，经常在晚饭后过来拜访。”在这样的场合下，安静、休闲地坐在旁边聆听成了她晚饭后的习惯，并且这种习惯一直陪伴了她的一生。玛丽·佩利并不是因为害羞才在一旁沉默。起初在布里斯顿的几年里她的确有些害羞，那时她经常和丈夫一起招待来访的客人。但是在1880年年初他们与威廉·拉姆齐第一次见面后，她的这一性格就有了转变。或许对于他们的表现可以理解为，马歇尔和他年轻妻子不愿意去奉承别人。在马歇尔夫妇组织的一次娱乐活动中，有一位学生给拉姆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个学生同马歇尔夫妇一样都不愿去奉承别人。在进一步的接触之后，拉姆齐被玛丽·佩利内在的魅力所吸引。之后，拉姆齐和马歇尔夫妇的关系变得十分友好，来往也就更为密切。拉姆齐那连绵不断的描述足以说明他对马歇尔夫妇看法的转变。他第一次是以化学教授的身份出席马歇尔的家庭宴会的，在见过马歇尔夫妇后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1880年2月），信中这样描述马歇尔：“他是一个道德修养很高的人，仿佛全部是思想而没有肉体。他对于自己的演讲总是犹豫不决，衡量每件事情都非常谨慎。所以我认为需要一个合适的人去指导他，如果方法正确，他将取得更大的成功，我认为我能够给他最合适的方法。”此外，这封信还对玛丽·佩利进行了描述：“她犹如刚刚痊愈的人（就是一个性格孤僻或行为古怪的人），好比一只母老鼠，没有耳朵，但有很多头发在后面形成一个下垂的假髻；咀嚼的牙齿非常突出；习惯抱着一只膝盖并旋转她的椅子；死气沉沉的没有一点声音——这就是一位女政治经济学讲师。当然，这只是我对马歇尔夫妇的第一印象，我们期待以后的改变。”

与马歇尔夫妇更加熟悉之后，拉姆齐对他们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周之后拉姆齐写信跟母亲说：“昨晚我又和马歇尔共进晚餐了，马歇尔夫人不再像我之前描述的那样，她开始在草地上打着网球，表现得很开放。”通过拉姆齐向母亲的描述，在5月份，他与马歇尔夫妇一起在后花园打了两次网球。很显然，在这两次运动之后，拉姆齐感受到了马歇尔夫人的热情。在6月份的信中，他表达了对这对夫妇的喜爱之情，并且解释道：“我不能说特别地喜欢她，但这的确是她的优点。她前面的牙齿很整齐，总体看上去很好看。至于马歇尔，当我们有